

李大钊与“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的关系

马金玲, 刘 苗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710049)

摘要: 国民党一大后, 李大钊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实际领导工作。为扩大民主联合战线、开辟北方战场以策应南方北伐, 李大钊针对冯玉祥及其领导的国民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针对五原誓师后国民军的出路问题, 冯玉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制定了“固甘援陕, 联晋图豫”战略。其后, 在李大钊领导下, 中共北方党组织实施了联络阎锡山、妥善处理陕西战役善后问题、分化河南直系军阀等策略, 推动了既定战略的实施, 促成了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通过分析李大钊与“固甘援陕, 联晋图豫”战略的关系, 可以进一步挖掘李大钊统一战线实践的丰富内容, 从而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 李大钊; 冯玉祥; 国民军; “固甘援陕, 联晋图豫”战略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3)04-0001-07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3.04.001

Li Dazhao and the Strategy of “Consolidating Gansu to Assist Shaanxi, Uniting Shanxi to Conquer Henan”

MA Jin-ling, LIU Miao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Li Dazha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actual leadership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orth China. In order to expand the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and open up the northern battlefield in response to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the south, Li Dazhao actively carried out the united front work for Feng Yuxiang and his National Army. In view of the future for the National Army after the Wuyuan Oath, Feng Yuxia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Li Dazhao, formulated the strategy of “Consolidating Gansu to Assist Shaanxi, Uniting Shanxi to Conquer Henan”. Lat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i Dazhao, the Northern organizations of the CPC implemented strategies such as contacting Yan Xishan, properly handling the aftermath of the Shaanxi Campaign, and dividing the Zhili warlord in Henan, which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stablished strategy and facilitated the National Army to join forces with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rmy in the Central Plains. By analyzing Li Dazhao's role in the strategy of “Consolidating Gansu to Assist Shaanxi, Uniting Shanxi to Conquer Henan”, we can

作者简介: 马金玲(1964—), 女, 陕西西安人,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刘苗(1998—), 女, 甘肃陇南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further explore the rich content of Li Dazhao's united front work, so as to provide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this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Li Dazhao; Feng Yuxiang; National Army; the strategy of "Consolidating Gansu to Assist Shaanxi, Uniting Shanxi to Conquer Henan"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作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探索者,李大钊为开辟北伐北方战场、推进国民革命,指导并帮助冯玉祥制定并实施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成功将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纳入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之中。梳理李大钊与“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的关系,透视革命统一战线在国民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对于正确认识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历史经验的重要地位、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的确立

(一) 争取冯玉祥,开辟北伐北方战场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中央威权失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陷入了割据混乱之中。连年战乱与政治动荡不断削弱着北洋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这就给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问鼎中央政权、再造民主共和提供了机会与正当性。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将推翻封建军阀、统一全国作为革命目标并计划实施北伐。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河南、两湖地区及河北、陕西大部,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及安徽五省,奉系军阀张作霖则占据东北三省及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此外还有各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因此,军阀实力远胜于北伐军。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胡景翼与孙岳等率部反戈倒直,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此后,

国民军势力迅速扩展到北方和黄河流域大部,因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故其在西北地区根系尤深。“北京政变”后,段祺瑞主政,却与奉系张作霖暗通款曲,奉军乘机入关,段、张共同把持北京、排挤冯玉祥。随着国民军与段、张等军阀之间矛盾的加深,冯玉祥开始策划反奉倒段运动。与此同时,南方革命势力也迅速发展,“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1]¹⁶³。在此形势之下,直奉军阀“两个‘仇敌’在对付‘赤色危险’面前,具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2],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组成了反革命联合战线,以对抗国民军和北伐军。

复杂的政治局面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冯玉祥及其国民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一方面,从统战对象的角度出发,冯玉祥本人具有革命倾向,与其他旧式将领明显不同,其领导的国民军“比奉、直、皖及其他北方任何军队都有训练,有纪律,不扰害人民”,“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天津,都相当的尊重人民之自由”,“不像奉、直、皖各系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像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①;另一方面,从国民革命战略全局考虑,在北伐军兵力及资源远不及北洋军阀的情况下,占据西北的国民军更显举足轻重,争取形成北伐军与国民军南北呼应之势,对于北伐胜利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改变了冯玉祥是帝国主义“新代理人”的看法,认为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3]。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强调指出团结帮助国民军的重要意义,国民军既已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

① 见独秀《国民军与北方政局》,载《向导》,1926年4月23日。

确有反对反动军阀之态势,“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1]61}。至此,中共确立了团结帮助国民军以策应北伐的方针,并确定由李大钊“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工作”^[4]。

1926年3月,冯玉祥赴苏游历以学习革命经验。1926年5月至8月,国民军与奉直晋鲁军阀组成的“讨赤联军”在南口展开激战,国民军不敌联军,损失甚重。鉴于此种不利形势,李大钊再三督请冯玉祥尽快回国以收拾残局。9月16日,冯玉祥到达绥远五原,次日举行誓师大会,公开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纲领,参加国民革命。

(二) 李大钊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后续战略部署问题亟待解决。为开辟北伐北方战场,使其与南方战场相互策应,李大钊提出并指导冯玉祥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这是李大钊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统战工作的一大胜利,对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成立国民党北京执行支部,同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实际领导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的工作。国民军南口战役大败,仓促西撤,损失极为惨重,北方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对国民军的撤退路线作出正确判断:“国民军既如此失败,其出路或不免于向甘、新垦殖边陲与占领陕西,东出潼关与中原友军汇合,以与国民革命军相呼应。前者迟慢而且敌之随踪迫来,并未能安以垦殖,后者,则虽有几分冒险,但国军惟一有希望的出路,确不离乎此。”^{[5]173}李大钊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也分析指出,此次西北国民军之退却,“是因为主帅之无谋”,“惟一的希望在冯即日回包,还可重整旗鼓”,而国民军后续作战的战略应是“出

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①。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认为国民军南口战败后应立足甘宁、占领陕西、东出潼关,以牵制直奉军阀使其不敢贸然南下,从而造成国民军与北伐军南北相向之革命形势。对此,冯玉祥则认为:“言宜分兵陕、甘,出潼洛,下襄汉,余思此事谈何容易,我军之枪械、兵力及地方补充,均远不若张、吴,坚守南口,徒蒙无谓之损失耳,有何益耶?”^[6]不难看出,此时冯玉祥对李大钊所提战略尚心存疑虑。

(三) 冯玉祥接受“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

在北伐已然启动、国民军南口战败之际,于右任应李大钊之邀前往苏联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经与冯玉祥秘密商谈,两人商定“由于带二、三军残部并一部分国一军经陇南入陕”^②。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也写信给李大钊称“于髯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颇佳”^[7]。冯玉祥在归国途中致电国内,“谓此次回国,誓必积极进行革命工作,最要紧的是要把西北军赶快的与北伐军接连起来。……要分三路进兵:一路由甘肃入陕,由陕西入汉中或出潼关;一路入山西攻取太原,出娘子关或紫荆关;一路由京绥路出南口攻取北京。此计划要即日实现”^③。因冯玉祥尚未完全掌握国民军南口败退情况,这一作战计划并不符合实际,故并未得到实施。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重整旗鼓。关于军队后续作战方略,国民军内存在两种意见:一是部队由五原回师,反攻南口,然后东进攻取北京;二是由五原挥师西征,经甘肃,进取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在《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报告中指出,国民军已与南方国民政府形式上取得一致,国民军今后的出路“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

① 见《守常政治报告》,载《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3号。

② 同上。

③ 见柏钧《北方军事政治状况(十月一日北京通信)》,载《向导》,1926年10月19日。

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暂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1]330}。其间,李大钊派人北上绥远送密函给冯玉祥,其中写明奉鲁孙三方的兵力、驻防情况及其他重要军事消息,以给冯玉祥作决策参考,并“建议出长安会师郑州”^[8]。冯玉祥据此“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9],进一步巩固甘陕,增强兵力,以图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的实施

“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为危势凸显的国民军指明了出路,其后巩固甘陕、挥师东征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很大程度上“都是实行李大钊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的结果”^[10]。这一战略的基本内容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固甘”,二是“援陕”,三是“联晋”,四是“图豫”。

“固甘”即国民军驱除地方势力、稳固甘肃全境后,以其为出兵陕西、挥师东征的后方补给基地。“讨赤联军”与国民军在南口、多伦等地激战时,吴佩孚策动张兆铔、孔繁锦率四万余人进攻兰州,当时刘郁芬部驻甘国民军兵力总计不过万人,兰州岌岌可危。1926年6月下旬,国民军吉鸿昌率部由绥远援甘,马麒与马鸿逵两部亦来甘肃助战,南口败退的国民军向宁夏和甘肃集结,兰州国民军不断壮大。8月,张兆铔、孔繁锦溃败逃出甘肃,甘肃战役胜利。

“援陕”即为解西安之围,占领潼关。1926年4月,吴佩孚委刘镇华“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之职,命其集结旧部,“乘机占潼关,趋陕西”^[11]。刘镇华部很快扩编为五个师,以号称十万之众进入潼关^[12],而陕西仅有国民军二军和三军余部的李云龙、杨虎城等少量部队,武器粮饷异常缺乏。刘镇华部兵临西安城下之后,即以优势兵力攻城,但刘军多为收编土匪,缺乏重武器,见无法一举攻破西安,便采用围困战术,企图困毙城内守军。甘肃战役胜利后,冯玉祥立即决定援助陕西,国民军以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援陕副总指挥”,分兵七路,

由“孙良诚率前方各军,由邠州大道,迅速向西安攻击前进。另以驻天水之张维玺师进攻陇县、沂阳,以掩护大军之右翼”^{[13]472}。11月,被困长达八个月的西安终于解围;12月,国民军进占潼关,援陕战役顺利结束。

“联晋”即国民军需协调好与阎锡山及其晋军的关系,削弱“讨赤联军”的力量。1926年,“讨赤联军”使国民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困境地,而处于联军和国民军之间、政治态度一直摇摆不定的阎锡山及其晋军自然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国民军为攻取陕西,必须设法争取阎锡山保持中立,否则,如若晋军为刘镇华部提供外援,国民军东侧必受此威胁,解围西安和东征河南都将受到更多阻力。

“图豫”即国民军东征河南,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共同围歼直奉残部。1927年初,南方北伐军已攻克长江流域的大部省份,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国民军亦在北方营造革命态势,致使张作霖节节败退。冯玉祥进驻西安后,积极整顿部队,“分兵三路,向鄂、豫、晋、绥四省进展”^{[13]473},形成了南北夹击北洋军阀的新局面。

“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在北伐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固甘”是稳定西北战场之基本保证,甘肃能够为国民军后续作战提供后勤保障和战略支撑,“不仅避免围攻西安之镇嵩军与后追之奉军前后合击的危险,而且能够对西安形成东西合围的态势,在战略更有利”^[14]。“联晋”则是为了分化“讨赤联军”,晋系的中立乃至联冯抗奉消除了国民军“援陕”与东进河南的后顾之忧。陕甘已平,晋军也表示出加入革命联合战线之意,这就为“图豫”即南北两军会师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李大钊推动“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实施的策略

国民军确立“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后,李大钊又通过联合晋军、稳固陕西、分化直系军阀等策略,进一步帮助国民军实施了这一战略。

(一)积极联合晋军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进一步加强了对甘肃

的管控。行政上,刘郁芬加紧了对甘肃全境的统治,重要行政长官悉由国民军内人员担任;军事上,冯玉祥遣佟麟阁、韩复榘入甘,剿灭张兆钾和孔繁锦残部并就地征兵筹饷。甘肃既定,中共中央在1926年11月写给北方区委的信中指出,“联合山西阎锡山以抗奉”^{[1]420}是冯玉祥后续经营西北、策应北伐的关键。据此,李大钊积极开展对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使其联冯反奉。

南方北伐军消灭直系军队主力、北方国民军五原誓师之后,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1926年10月,冯玉祥与刘伯坚亲自到包头,与驻扎绥远的晋军将领商震取得联系,这次会面颇有成效。冯商面谈后不久,阎锡山对冯玉祥表示出友好的态度,不仅给国民军提供了物资援助,而且归还了被其收编的国民军部队。乘此时机,李大钊通过晋阎驻京代表询问了阎锡山的态度。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李大钊提到“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但此时幸为严守秘密云云”^①。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李大钊进一步致电阎锡山,先肯定了阎“辛亥之役,曾建丰功”,后勉励其投身国民革命:北伐军已逐渐控制长江流域,国民军雄视西北,如果晋军加入革命战线共同作战,奉系军阀将不能造成威胁,山西也将更加巩固;并告之冯玉祥亦清楚晋系为难之处,已赴平凉督战^{②③}。电文还深刻分析了革命形势,阎锡山深受触动,也减轻了对冯玉祥东山再起的疑虑,遂复电告李大钊,“此间与党军同行,早有决心”^{[15]711}。就在阎锡山向李大钊表明革命倾向之际,张作霖正向西北增兵,扬言要进攻五原,并严令阎锡山击退国民军。阎锡山立刻向李大钊表明对奉军威胁的忧虑,李大钊对此的回复是,奉张此举

不仅意在五原,且意在威胁山西,“现在统筹全局,不能让出五原。设敌进逼,惟有一战,望山西亦速加准备,至必要时,与我军一致动作”^④。阎锡山对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的军事部署表示赞成。1927年1月,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中指出:“阎现在特别对国民政府表示亲近,愿意回到K·M·T中来,愿意组织北方国民军反奉。”^[16]3月,阎锡山接受武汉国民政府批准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任职并承诺:“此间已预备好,一俟西北军发动,当即一致动作。”^{[15]735}。在统战工作的推动下,至1927年初,“山西全省中共党员增加到近一千人,工农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17]。李大钊争取阎锡山加入反奉统一战线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山西革命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就为国民军巩固陕甘、会师中原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处理陕西战役善后问题

陕西大乱初步平定,省政万端无绪,且“冯于二人都有西北王的倾向,表面上虽尚各自以革命为言,骨子里则包含了很大的冲突”^⑤。驻陕国民军各部争权夺利,纷争四起。奉系军阀调兵遣将直指陕西,革命形势更趋复杂。

面对这种情况,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第一,要求陕西党组织尽力协调国民军各部。冯玉祥曾提到,“问题不在现在解西安之围,而在解西安围之后。我深知二军性质,今日解了他的围,明日他可缴我的械”^⑥。中共北方区委在给西安地委委员魏野畴的信中,对国民军内部的矛盾进行了剖析:“一军不满二军之土匪行为,二军又忌恨一军之把持枪械,甚至疑惧一军解决他们。”而此时奉

① 见《守常同志来信(十二月五日)》,载《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14号。

② 同上。

③ 见《国民政府与晋阎之关系(一):白和通讯》,载《中央政治通讯》,1927年第15号。

④ 见《国民政府与晋阎之关系(二):白和通讯》,载《中央政治通讯》,1927年第15号。

⑤ 见《陕西最近军事状况》,载《中央政治通讯》,1927年第15号。

⑥ 见《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载《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12号。

张将国民军视为最急需消灭的敌人,时刻都在进行挑拨分裂。在这样的处境之中,陕西党组织必须注意劝告国民军各部“诚意合作,始能免于灭亡,否则十分危险”^①。第二,协调冯玉祥与于右任之间的关系。中共北方区委认为,“冯于关系现在虽然不好,但还谈不上是什么地盘的冲突,因为在于方面,此时尚莫有能力统治全陕,而在冯方面,亦因有河南方面发展的可能,亦无占领全陕地盘的必要。不过事实上,一军为在军事上便利与安全起见,必然要占领陕西一部分地盘。一军此种行动或亦不至于影响到冯、于关系”^②。在对冯玉祥和于右任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李大钊提出陕西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努力使冯、于之间关系弄好”^{[5]191}。第三,中共北方区委提出《北方区对于三特区及西北军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阐述了国民军中党的工作的重要性。国民军在政治上已有明显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尚未有下层的基础,但现在冯之左倾,却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机会。按国民军现在的地位看来,我们自然不能轻视在国军内之工作”^③。为加强国民军的政治工作,中共北方区委特派陈乔年去西北考察实际情形;同时除要求中央速派谭平山及王一飞同志去国民军中工作外,北方区委还指定其他同志经短时间特别训练后准备参加此项工作。通过举办政治训练队及报刊宣传等,国民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明显改进。“国民军还学习黄埔军校的做法,组织士兵做群众工作,既加强了国民军和工农群众的联系,又促进了国民军的自身改造。”^[18]基于以上,陕西及国民军内部平定,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为实施“图豫”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分化河南直系军阀

1927年5月,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亲赴潼关指挥国民军东征。李大钊虽然在国民军东征河南之际已英勇就义,

但他生前致力于分化、争取驻河南的直系军队,为国民军成功实现“图豫”战略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革命军队与奉系军阀作战过程中,河南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国民军取得河南,便可与北伐军共同夹击奉军;反之,奉军占领河南,便可阻断国民军与北伐军的联系,即时北方战场将会陷入困境。当时,国民军经过陕甘战役、北伐军在南方战场连续作战,都需要适当的调整补充,不宜立即对奉作战,此时分化、争取河南直系军队就成为一个重要策略。1926年10月,吴佩孚军队败退河南,其驻豫残部军心涣散、派系复杂,各部实力相当,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是国民二、三军的旧部,同国民军关系较好”^[19]。而此时奉军借援鄂之名,沿京汉线南下,大有取得河南之势。直系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部在此严重形势下,决定倒直反奉。针对这一有利时机,中共中央要求,“对河南宜急速联络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占据豫南以阻奉军,俟北伐军和国民军准备都充足再合力进取”^{[1]485}。同时,靳云鹗派代表到武汉接洽,国民政府声明,靳等如能赶走吴,并服从国民政府,则可进行接济,这就为李大钊争取靳云鹗等部加入反奉统一战线提供了机会。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李大钊针对河南的情势阐述了自己的策略,即“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如中央以为此策可行,即请去函汉口推进此事,无论如何总不使靳等归奉”^④。此前,李大钊曾派专职做军事统战工作的彭泽湘联系河南军阀,并要求中共豫区执委的同志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以配合北伐。在此基础上,经过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一段时间的努力,争取靳云鹗等部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果,1926年12月,北方区委在

① 见《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给魏同志信)》,载《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13号。

② 见《白和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十二月十五日)》,载《中央政治通讯》,1927年第15号。

③ 见《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载《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10号。

④ 见《守常同志来信(十二月五日)》,载《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14号。

给中央局的报告《天津会议与北方时局》中提到,“靳、田、魏等确已与党军发生正式关系”^①。李大钊成功分化了河南直系军阀并争取其参加反奉作战,为国民军东征河南减少了一定的阻力。

1927年6月,国民军与北伐军成功会师中原,“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至此全部实现。虽然,冯玉祥在国民革命后期转向反动,国民军变质为反革命的军队,但李大钊围绕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所开展的统一战线实践之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在革命实践维度,“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极大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第二期北伐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根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统一战线维度,李大钊在国民革命时期开展了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初步发展了中共统一战线思想,为党的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为中共改造和利用旧式军队提供了范例,也因为指导陕西党组织与国民军及当地军阀发生联系,故为在西北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李大钊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共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起到了推动当时革命实践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历史镜鉴,不愧为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先驱。回顾李大钊为实现南北革命军队会师中原所开展的统一战线实践,以此描绘中共早期统一战线发展的脉络轨迹,更能深刻领悟我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始终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初心使命,更能深刻理解“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 王宗华,刘曼容. 国民军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129.
- [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64.
- [4] 李葆华.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N]. 人民日报,1979-10-29(3).
- [5]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6] 冯玉祥. 冯玉祥日记:第2册[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18.
- [7] 蔡和森.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8.
- [8]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4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681.
- [9] 冯玉祥. 我的生活[M]. 长沙:岳麓书社,1999:460.
- [10] 阎稚新. 李大钊和冯玉祥[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201.
- [11] 来新夏.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北洋军阀(五)[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60.
- [12] 来新夏. 北洋军阀史:下册[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1007.
- [13] 来新夏.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北洋军阀(四)[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14] 吴汉全.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93.
- [15]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二)[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 [1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3.
- [17] 吴家林,李美瑞. 李大钊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思想及其运用[J]. 齐鲁学刊,1987(1):63-70.
- [18]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03.
- [19] 吴家林,谢荫明. 北方区委支持北伐战争的概况[J]. 历史教学,1987(9):27-31.

(责任编辑:白丽娟)

^① 见《天津会议与北方时局(十二月五日北方区报告)》,载《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14号。